



忠臣

袁劲梅 著

逆子

忠臣 逆子

袁劲梅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忠臣逆子 / 袁劲梅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68-2672-3

I. ①忠… II. ①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1727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外图(厦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 / 许艳辉

选题策划 / 王 哲 马志明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戴荣芝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 100073)

电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开本 / 870毫米×640毫米 1/32

印张 / 13

字数 / 240千字

版次 / 2012年2月第1版

定价 /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推荐序 | 天生的小说家

东年

北京豆瓣读书网说袁劲梅出身大家族，曾祖父是前清戍边功臣，祖父是辛亥革命志士，父亲是著名生物教授。若真，则这背景和《忠臣逆子》中的戴家小姐相似。前教育部长吴京，是她的表哥。

为了分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把中国当时的阶级细分如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无产阶级（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工人）、以及游民无产者（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

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主轴，要不是写这些阶级间的斗争，就是写对斗争不休的世界感到绝望；前者就是革命文学，后者就是颓废文学。以后，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大陆在借鉴和追求现代化的同时，现代主义思潮才开始更加涌入大陆的文学创作，而有了“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以及随后我们熟悉的各种现代流派以至后现代。袁劲梅的小说图像，难免带有改革开放后的色彩，但是，《忠臣逆子》几乎可以看成三十年代小说的总复习，而且为那个时代的革命小说和颓废小说整体写了续篇。。

《忠臣逆子》中戴家的崩溃瓦解，我看是遑遑如《红楼梦》的贾家。但是，在《红楼梦》的结尾中，贾宝玉光头赤脚，披一领大红猩猩在雪地向父亲拜别，出家去了，极其苦楚；戴家小姐则干脆认赔，更加入世，写了《忠臣逆子》来开示一种无比的宽容和睿智：可是，在我还时常出入于我奶奶的厕所和剧院的时候，上流、下流在那中国的戏局里是分得很清楚的。为什么要分得这样清，一是因为中国那出戏的戏局是根据“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设的，二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像中医，从一代代先人帝王治国的经验中收集出无数“斗”的法子，一一拿来试。人多，人穷，“斗”似乎就成了解决社会问题、控制社会权力的一剂药方。

我和我奶奶一起看戏多了，我奶奶还教了我几条看戏的法子。她说：“人年轻的时候都在演戏，演戏的时候，就跳不出那个戏局，到老了就爱看戏，看戏的时候，还是跳不出那个戏局。人在戏局里，好坏都由戏局定了。啥时候人演戏、看戏的时候，都时时知道那不过是个戏局，人就真会看戏了。虽是这个理，就是怕人做不到。”（袁劲梅，《忠臣逆子》）

这样的戏局，在台湾看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第一次在二〇〇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终审作品中读到这篇小说，虽然字里行间多的是顽笑或自嘲，我还是能够深深感受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这和诗人雪莱读《堂吉珂德》，说“这个悲剧让人泪水中带着微笑”的感受，我想当是相似的。事实上，我后来也知道她每年总会带美国学生去大陆的穷乡僻壤，做旅游和户外教学。

袁劲梅当是在评审记录中，读到我的善意；我对于这位可能的戴家小姐，确实也很同情，当然我非常欣赏她的写作潜力。二〇〇三年，我那时在联经出版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历史月刊》总编辑，就请她为月刊系列撰写《美国小镇文化》，鼓励她既然离开故土成为美国作家，如此就得好好认识美国；美国毕竟不是电视或电影上的五光十色和肤浅，何况她任教的大学还有法、英和印第安文化存在。我这样建议是不希望她终究会像大部分的华裔作家，写尽故国材料后随波逐流，在现代或后现代的形式中泡沫化（我们文学界常在跨科际的借用中把思想削足适

履成形式)。我当然知道她访问过一些美国小镇，但是在本书她的自序中读到她走访了一百多个小镇，让我非常吃惊；美国小镇间不像台湾的人居聚落多是鳞次栉比，其间距辽远开阔多有诗人埃米莉所见的荒芜，或者随时可能跑出小说家福克那笔下的熊。至于在《罗坎村》那样比较中、美文化、人性以及农民的性格，而且能够生动有趣地写出美国小镇的人物和生活，是她自己的天分。

因为忙，我很少给人家出书写推荐序；为袁劲梅写，因为她表示自己是在“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获得鼓励 and 自信，而能开始在大陆投稿，且即连获殊荣。所以，我特地写来赞美“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但是，袁劲梅确实也有特别值得让人欣赏和学习的，因此，我也以为非写不可。

这让我想起哲学家、数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曾经回忆两位小说家。他批评一位极富盛名的小说家汲汲营营以沽名钓誉，人品极坏（我姑且隐其名），另赞美康拉德：说自己曾在康拉德死前看过他一次，又说康拉德曾经埋怨有人不了解他的海洋文学，而辩护说他的文学同样是在追求人类的秩序。罗素没说康拉德表示的人类的秩序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可以替罗素或康拉德说个清楚。那种秩序，就是航海精神。航海是一种团队的探险，需要勇气、忠诚、服从、踏实、协调，以及要有能够容忍困境、损失和各种苦恼的修养和训练（这正是康拉德小说的主题）。这种精神其实也无关海洋不海洋，无关个人的自由和发挥，有关人际或公民社会的标准，也正是中国和台湾社会所欠缺的。戴家小姐，在《忠臣逆子》中坦然面对自家在大时代中瓦解的困境和损失，正

如同这种精神。

乍看我提起罗素这样说两种小说家，袁劲梅一定讶异，我如果再写维根斯坦，她一定更吃惊；这因为我刚想起去年她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她的符号逻辑学导师科比教授（I. M. Copi）是罗素的学生、维根斯坦的同学。

维根斯坦有一本小书《逻辑哲学论集》是二次大战后那几年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著作。这本书向读者提出一系列简洁、封闭的“命题”；其中大部分的命题都以“不证自明”的方式表示出来，而且都被认为是“等值”的。他以“要是可以说出来的话，都可以说得很清楚”这个命题为起点，证明“可以说出来的话的确很少”，而“这些极少数的话都可以用逻辑符号或最好是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我以为这样的概念在小说写作来言，说的正是“图像语言”和“口语”。他还主张人们所提出的大多有关哲学的命题和问题并不是“不真”而是“没有意义的”。我以为小说写作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小说写作问题，不是好不好真不真，而是没有意义。

袁劲梅糊里糊涂选了科比的课，以后才知道他是符号逻辑之父、现代计算机语言奠基人。她是他的关门弟子，得意门生；我在袁劲梅的博客读到她这样回忆她的恩师：

我们这些贫穷的中国留学生，就那么一点奖学金，去买菜都是拣最便宜的买，有点钱还想着往家里寄，我路过“金环/王环”无数次，从没过进去吃一顿的念头。科比博士把我带去了，我大吃了一顿不说，

没吃完的菜又都给我带回来。不仅如此，以后每隔一个星期，科比博士就把我带到“金环”大吃一顿。我每次得意洋洋带着没吃完的菜回到系里，其他同学就会不无羡慕地说：“科比博士又请客了？”……科比博士不仅请客，还讲老故事给我听，这些老故事天南海北，有的深刻，有的幽默，每个都充满人性。（袁劲梅，《人性和符号——我和符号逻辑大师I.M.科比博士的故事》，<http://blog.sina.com.cn/yuanjinmei>）

这样我们看到了科学、哲学对一个小说家的技术和思想传承，看到了“感性”和“精确”并存；而我藉此要说的是，写作，特别是写小说，主要是使用右脑。当然，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把包括小说的文学，视为“艺术”，是使用左脑；所以，我将左右脑的官司功能，分列于后，让大家比较参考。左脑功能：说话、阅读、写字、综合性的语言记忆、抽象的分类、学习音乐的能力、连续性的细微动作、一次可看见一项以上的事物、详细画面。右脑功能：阅读中能掌握隐喻的含义、容貌识别、身体左侧及视觉空间的合一、空间知觉、路径探索能力、视觉结果、音乐的感觉、综合记忆的形成、能分辨左右、适当画面的形成。（Thomas R. Blakeslee, 1981）我相信读者，特别是小说创作者，可以在《忠臣逆子》的文本中，读到写作的右脑。

袁劲梅在自序里说了不少自己的作品，我就不再画蛇添足；写完了戴家，我们也会期待她多写别家，或者再写中国革命的第三部曲。她的写作态度、现象，特别是她的小说语言和思想，以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如此奇妙，也都是我极力推荐的。

自序

本来我并不能肯定我可以写小说。二〇〇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奖”告诉我：你可以！这个“可以”，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门，门牌叫：“可能性”。我心惴不安，又无比兴奋地走进去。一路都感到《联合文学》的文学前辈们对新人的扶持和指导。这种长久的扶持与指导，在多年之后，让我认识到“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意义不仅是对新人说一声：来吧，你可以走进文学殿堂，而是把一棵偶然从地里长出来的橡树芽儿浇灌成橡树。我就是那个非常运气的橡树芽儿。

在这几年里，二〇〇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评委东年老师指导我干了一件大事：研究美国文化，从最基础的美国小镇研究开始。一次又一次我觉得没啥可研究的了，东年老师又给我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一走进去，果然又是柳暗花明。在走访了一百多个小镇之后，我觉得，我对西方文明可以说话了。

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我选择了写中国：中国事，中国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国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系看中国文化，如同一条跳出池塘的鱼，回头一看，自己待惯了的池塘原来只是几个池塘中的一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那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站在池塘外面写出来。中国古话叫：知己知彼。没有东年老师叫我做的细致的“知彼”工作，我写不出好的“知己”小说。

我的二〇〇三年得奖中篇《忠臣逆子》开了一个头。下面的几个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手法写下去的。《忠臣逆子》从一个家族——戴家——的变迁史，看中国百年一次次革命的近代史。从曾爷爷的辛亥革命，到戴家大小姐走出国门，后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都以为自己走的是条新路，却不知道那“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好果子。用暴力夺来的权力，只能用暴力来维持。把悲剧用喜剧的语言讲出来，是戴家大小姐对家族史作的反思。

人当然有纯人性，但把一个家族放到中国历史中去了，写作就自然从“纯人性”转成了写“中国人性”。人，可以是社会人，社会人依然是人，这是我想写的人性。从这个中篇开始，故事的枝桠就向各个方向长出来。戴家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活着，走到哪也摆不脱一条长长的影子，这个影子叫“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现代，都是这个文化的海洋里翻起的波澜。若在写“人性”的小说里，不能画出几张文化脸，其实，就根本没有什么好写的。文化不是抹在脸上的粉子，是人性下面的东西。讲吃喝是人性，可讲到划拳和行酒令就是

文化了；讲上床是人性，可讲到在喊床的时候叫“挨千刀的”就是文化了；讲爱情是人性，可讲到“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文化了。

这样的文化如此深厚，即便中国人走进了现代化，也还在这个文化里折腾。于是，就有了《罗坎村》。故事从“历史人”转到了“当代人”。当代的生活，反迫使戴家大小姐研究起儿时生活过的罗坎村。罗坎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也是一个大社会。这样的村子很普通，随便一指，前方那个就是。罗坎村的根牢牢地长在中国的土地上。走进罗坎，一定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性”的问题是一个“家文化”的问题。中国历来有灾有难，却依然成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国家，对家庭关系的规范和热爱，是流在罗坎人血液里的道德密码。而这密码里的每一个符号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是农民，在山多地少的村落里住了三千年。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亲缘关系是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认命，认官，认亲朋好友。正义不正义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人际关系。是非对错，靠包青天裁决，公众利益靠父母官代表……突然间，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人不想当农民了。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物贸中心，有了市场，出了国，选择了工业化，成了自由劳动力。可是在这些新地方，我们还是只会靠人际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结果，这就像咱们爷爷辈脑袋后面拖的那条封建主义小辫子，又难看，又可笑，又气人，还滋生腐败。这就是我挖掘出的现代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走到哪儿也没走出罗坎这个圈子。（《罗坎村》获二〇〇八北京文学排行榜；二〇〇九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二〇一〇茅台杯《小说选刊》奖。）

每一种文化其实都是有一些陋习的，只不过文化这种东西像空气，像水，在一个文化框架里生活时间长了，有些陋习就成了习惯，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可也就这么做了。但是，如果有另一种文化作镜子，也许就可以看清楚我们陋习的可笑。这样就有了《九九归原》。放荡不羁的戴家大小姐，到了美国，在一个谈“形而上”的中国精英人士的圈子里，拿起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作镜子，肆意调侃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圈子里一群从中国文化里走出来的男男女女都是聪明人，他们出了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社会接轨。他们的初衷是想要摘西方文明树上结出的好果子：民主、自由、爱情。可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好果子刚拿到嘴边就变了味。那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这些果子，而是因为他们脚下那块有几千年深的农耕文化土壤，没有让这些果子健康成长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穿西装，喝香槟酒不难，但文明远不止这些。文明起码要有一套健康的价值观。戴家大小姐说：我们是一群农民，懦弱、荒唐、小心眼。我们急急忙忙向现代化赶去，要把自己西化了。可是，我们就算开进了美国，折腾来折腾去，到临了依然还是只会按着农民社会的价值观行事。我们的文化基因上带着病。（《九九归原》登上二〇〇六年北京文学排行榜。）

这病在哪儿呢？从五四开始，中国人就想要“德先生”进门。但是民主是有代价的。戴家大小姐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儿，看见西方的好东西，就想往娘家搬。西方的民主好，西方的民主教育好，这个大苹果该摘了送回去。可搬回去能不能用，用起来会有哪些冲突？先看一个试验。《老康的哲学》写了戴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和西

式教育下长大的儿子戴小观的冲突。老康正合中国男人的模式：满身活气，却不求真理只认等级；热情洋溢，却不愿守法律，喜欢变化无常；虽留洋在外，却时刻不忘吃五花肉。形象不是阿Q，却有一些叫“阿Q”的祖辈。撒谎，好新，传统，没有野心，向往好日子。老康是个普通人，性情中人。普天下这样的“老康”多多。传统的中国人老康，兀突站在另一片没有中国文化的土地上孤军奋战。身上无处不散发着中国特色。这时候，这个中国人就不再是一个“老康”，而成了一系列我们不自觉地固守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成了“中国哲学”，体现着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中许多信条和西方的民主有根本冲突。民主，在五四之后，以“德先生”的名字到过中国。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民主的生活方式怎样？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却没有自己生出个“德先生”来？从外面请一个来，是借来的，是客人。我们中国人好客，但光好客还不行。借来的机制是衣服，不是实质。借来的机制只能以“借来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实质不变，玩民主也会选出土匪头子来。选举制是民主的衣服，是民主的操作方法。还不是民主本身。老农民都会用豆子计票，选举出村长、保甲长来呢。选出来还不是照样横行一方，太上皇一样。民主的日子到底怎样过，我们不知道。“德先生”进了中国，在中国也坐不住。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他的位置。和“德先生”冲突的是我们几千年的等级制。（《老康的哲学》由《小说选刊》二〇一〇年一月刊重点推荐，并组织专家讨论。二〇一〇年郁达夫小说奖入选待定。）

不是我们不想好，是我们一代一代的目标没有一个正中靶心。路走

了一圈，“明天有多远”？阴差阳错，戴家大小姐的儿子在美国长大，倒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一改戴家大小姐对自家革命史的否定态度，饶有兴趣地和母亲一起追溯历史，又走进现代中国。儿子，用美国式的宽容，理解上辈人。母亲却继续批评前辈的革命。并且，在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发达了，深谙中国人性的戴家大小姐又把对社会的批判转向了自己这一代“实业派”。现代中国是这代人努力的结果。可是，奇怪得很，前人有的毛病后人又接着犯。前人费尽力气要扫荡的东西，风一吹，全回来了。（《明天有多远》首次发表。）

戴家的故事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从祖爷爷讲到祖孙子。戴家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古老的民族，不惜代价寻找出路的故事。对也好，错也好，重要的是他们在寻找。

袁劲梅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日

目 录



推荐序 天生的小说家 / 001

自 序 / 007

忠臣逆子 / 001

罗坎村 / 059

九九归原 / 133

老康的哲学 / 231

明天有多远 / 311

致 谢 / 395



忠臣逆子

Surely every medicine is an innovation, and he that will not apply new remedies, must expect new evils.

(当然，每一剂药都是一次革新，而那个不想运用新疗法的人，定是预计到什么新的邪恶。)

——培根